

##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十)

引文格式: 范逢春, 黎思. 迈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3): 40-49.

# 迈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范逢春, 黎思

**摘要:**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呈现制度本体变迁与持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双重特征, 先后经历了萌芽冻结期、复苏重启期、发展巩固期、深化改革期、创新完善期等五个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 由制度匹配下宏观制度的预设所决定, 由政治驱动下价值理念的更新所推动, 由利益博弈中行动主体的反馈所优化, 体现多重变迁动力。纵观改革历程, 关键节点下的渐进调适逻辑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动态调整, 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机制使收入分配制度得以持续巩固。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 坚持渐进改革下的节点创新, 构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以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共同富裕; 制度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 范逢春, 管理学博士,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黎思,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县域政治生态监测体系与集成治理研究”(22BZZ07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测度标准与提升策略研究”(SCJJ23ND28)。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3.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sup>[1]</sup> 共同富裕依赖于发展与共享的共同实现, 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富裕导向, 竭力探索并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虽然共同富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与行动路径, 但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始终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重要突破口<sup>[2]</sup>。既有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从实践角度探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发展演变<sup>[3]</sup>、成就经验<sup>[4]</sup>、问题困境<sup>[5]</sup>以及新时代改革趋向<sup>[6]</sup>等。二是从理论角度阐释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例如从经济思想史视角评述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sup>[7]</sup>,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按劳分配的形式与事实不平等, 按劳分配原则与按要素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sup>[8]</sup>。三是关注收入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分配制度改革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sup>[9]</sup>; 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滞后于共同富裕要求, 需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sup>[10]</sup>; 优化收入分配对于共同富裕有显著的驱动作用, 且这一驱动作用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sup>[11]</sup>;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有利于破解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问

题,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sup>[12]</sup>。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丰硕,但有关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变逻辑机理的研究还较少,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探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演进历程,深入剖析其变迁的结构诱因与内在逻辑,为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 一、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

### (一) 历史制度主义的逻辑意涵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政治学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up>[13]</sup>。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微观行动者视角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宏观结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中观视角对制度发展的历时性进行考察<sup>[14]</sup>。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在于:从共时性制度结构和历时性因果关系角度探究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变迁。

### (二) 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以结构观和历史观为分析框架。在结构观方面,历史制度主义重点解释诱发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制度变迁通常具有三种动力来源:其一,外部宏观环境,如政治经济制度是造成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其二,价值观念的影响,新观念的产生往往是引发制度变迁的先导。其三,特定制度下权力配置的非均衡状态会改变个人或社团组织的决策参与机会和利益格局,进而形成制度变迁的又一结构性动力<sup>[15]</sup>。在历史观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发生变迁或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关键节点理论侧重于研究制度变迁的特定时刻及其触发机制,认为关键节点是时间轴中“相对”较短、行动者能动性相对较强的时期,处于关键节点处的制度选择往往由拥有权力优势的关键行为者作出<sup>[16]</sup>。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引入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得以维系的机理,认为回报递增效应下制度安排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自我强化并趋于稳定<sup>[17]</sup>。

### (三) 历史制度主义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适用性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中观制度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制度表现,具备历史制度主义所需的特定视角与历时基础。其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受内外部制度环境、价值观念、权力利益等要素的影响,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有利于系统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最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兼具重要变迁与相对稳定的双重特征,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相适配,有利于剖析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基于此,本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以结构观为切口剖析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以历史观为依托探讨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 二、制度轨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其特征不仅体现“共同富裕”理论的动态演进,还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下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演变<sup>[18]</sup>,这正与“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相契合。基于此,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梳理既需要探索分配制度自身的变迁轨迹,又需要进一步把握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共时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萌芽冻结期、复苏重启期、发展巩固期、深化改革期和创新完善期等五个时期,体现渐进调适的鲜明特征。

### (一) 萌芽冻结期(1949—1977年)

第一,按劳分配原则的萌芽与冻结。1949—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劳动致富”<sup>[19]</sup>的分配政策。1953—1956年,我国推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基础上,按劳分配原则逐渐萌芽并发展。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按劳分配得以推行。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劳动的报酬,实行‘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城镇,工资制度逐步由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1952年,我国推动第一次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工人八级工资制和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执行湖南省统一规定的“工资分”计算单位,这是对按劳分配的初步探索。1956年,我国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用工资支付代替“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并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轻重程度等确定不同的工资等级,工资分配体系逐步统一,按劳分配原则也得以贯彻。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追求“一大二公”现象的出现,分配政策受“左”倾思想影响,陷入平均主义困境,按劳分配由萌芽进入冻结阶段。由于农村居民对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认识不清,“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sup>[20]10</sup>。第二次工资改革虽然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种分配制度也存在着分配形式过于单一化、分配结构和水平固定化、分配水平平均化的弊端<sup>[21]</sup>。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劳分配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大锅饭”盛行,按劳分配逐渐被平均主义所替代,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全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共同富裕的首倡。1953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要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来“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sup>[22]442</sup>。1955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年一年逐步推动的,其涵盖对象包括被改造为农民的地主阶级、被改造为工人的资产阶级以及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sup>[22]495-496</sup>。毛泽东还指出,产品分配要“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把人引向……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sup>[20]136</sup>。可见,这一阶段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与包括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在内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

### (二) 复苏重启期(1978—1992年)

第一,按劳分配原则的重启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初探。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体现为重新确立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sup>[23]</sup>这一要求助推了平均主义的瓦解与按劳分配原则的重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由此步入轨道。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在企业内部“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使职工工资充分体现对勤懒优劣的奖惩、不同劳动类型的差异,进一步细化了按劳分配的具体要求。在重启按劳分配原则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地位做出规定。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初步探索了债务利息、股份分红、风险补偿等其他分配方式,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分配原则的形成。

第二,“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萌芽。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纳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24]373</sup>。共同富裕牵涉分配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提倡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萌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纠正了平均主义思想,指出共同富裕不等于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sup>[24]111</sup>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

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要“兼顾效率与公平”<sup>[25]</sup>。“兼顾”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十四大对十三大效率优先于公平导向的调整。

### (三) 发展巩固期(1993—2011年)

第一,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巩固与其他分配方式地位的提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得以发展巩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也反映出“其他分配方式”的地位从“补充”上升至“并存”。

第二,“先富带动后富”的深化探索。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和国家继续提倡并深化探索“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对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系列有关分配原则的认识的重要转变,有利于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迈向共同富裕。

### (四) 深化改革期(2012—2018年)

第一,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制度的改革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并强调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2013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的发布,推动收入分配制度进入深化改革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工资增长机制、津贴增长机制等初次分配方式和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并将知识要素纳入报酬机制,完善了其他分配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亦强调“两个同步”,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该理念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有机统一,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既需要不断把“蛋糕”做大,还需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sup>[26]</sup>。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sup>[27]</sup>可见,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对分配领域中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阐释,还是对过去“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创新发展,更能够引导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进程。

### (五) 创新完善期(2019年至今)

第一,分配制度的地位提升与创新完善。一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另一方面,该阶段收入分配制度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第三次分配被正式提出。具体地,《决定》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第二,作为共同富裕制度保障的分配制度。“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就

“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作出一系列阐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的深刻本质、时代要求与价值内涵。其中,“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更加突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并举。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串联起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凸显分配制度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支撑作用。

### 三、制度演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变迁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轨迹这一外在表象出发,深入分析其变迁逻辑。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在分配制度本体及其对共同富裕作用的探索上体现出渐进调适的特征。这种渐进调适既由共时性的宏观制度环境、价值理念以及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所推动,又是历时性关键节点下的动态调整与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的共同结果。

#### (一) 结构诱因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动力

##### 1. 制度匹配:宏观制度的预设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生成和演变过程中宏观制度环境的作用。制度环境是关于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如基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sup>[28]</sup>。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均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影响,共时性的制度环境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根源。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sup>[29]</sup>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所有制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该阶段分配方式的多样性。“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分配的剥削关系,分配制度由多种收入分配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收入分配制度逐渐陷入平均主义的严重困境,甚至出现否定按劳分配的情形,出现“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制拓展到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这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与制度前提。按劳分配得到恢复并确立主体地位,其他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得到提升并得到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逐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这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在此过程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随着所有制结构变化逐渐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了收入分配制度本体的重大创新。

##### 2. 政治驱动:价值理念的更新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变迁中观念所发挥的先导作用,认为进入政治人物视野的话语会对其执政方略产生直接的实际的影响<sup>[30]</sup>。我国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均是特定时期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循序推进依赖于价值理念的历时性更新发展这一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大力推动“一化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指出,产品分配需要体现共产主义前途,避免分配的个人主义倾向。因而该阶段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得到拥护和推行。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公有化水平产生误认,按需分配、平均分配的分配原则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纠正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重新确立按劳分配原则,为激发人民群众生产建设活力奠定了有效的分配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

程中,党和国家对效率与公平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得以巩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得以确立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力持续进发;分配思想得以改进,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明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突出内容。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党和国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重视第三次分配,促进分配制度体系协调配套;坚持共同富裕导向与共享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

### 3. 利益博弈:行动主体的反馈

历史制度主义致力于挖掘特定制度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冲突所产生的不平等利益特权,以解释政治后果的差异性<sup>[13]</sup>。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是不同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政治统治并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推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体现出国家自主性理论下国家行为的自我维护特征<sup>[31]</sup>。在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下,仅允许按劳分配而排斥其他任何形式的分配。受制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合作社经济下的分配基础较为薄弱,分配制度逐渐陷入平均主义的陷阱,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人群体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进程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村集体、私营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投入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也因此产生新的反馈和诉求,由此推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但我国收入分配实践表明,仅仅依靠初次分配无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化。这是由于初始资源条件往往因行业、地区、个人而异,导致依赖既有资源的初次分配出现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问题。而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在弥补市场化资源配置缺陷的基础上,利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调节多层面的收入分配差距,以保障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利益。逐渐兴起并扩大的第三次分配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参与募集、捐赠、做慈善、资助、当义工等活动,也体现出利益主体在社会资源与财富分配上的自发参与和主动调和<sup>[32]</sup>。

## (二) 历史时序下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 1. 动态调整:关键节点下的渐进调适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生成后不仅存在稳定发展的正常时期,还具有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关键节点是制度发生变迁并形成路径依赖的重要标志。并且,历史制度主义更加关注较长时段内以缓慢和增量方式发生的制度变迁,主张渐进式、变革性制度变迁而非激进式、革命性的制度突变才是制度演化的常态<sup>[33]</sup>。由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见,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三大关键节点下进行渐进调适。

第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关键节点。社会主义改造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方面着手,全面变革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1952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达到78.7%;到1956年,个体经济占比下降至7.1%,资本主义经济占比接近于零,公私合营经济占比上升至7.3%,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占比高达85.6%<sup>[34]</sup>。这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阶级剥削性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被消灭。党和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相应建立“按劳取酬”“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原则,摒弃以往多种经济成分下的按资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我国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分配方式由自给自足转为集体供给,资本主义工商业分配方式由剥削转为劳动,原来的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均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sup>[35]</sup>。可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助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收入分

配制度的有益探索,初步确立按劳分配原则,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础上分配关系的调整。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经济体制改革对分配制度的影响表现为,它直接推动决定分配关系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按劳分配原则得不到贯彻,平均主义现象极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改变以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并通过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强调将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断巩固,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从必要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随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变革而优化。在目标上,提倡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制度设计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重新确立并不断巩固,其他分配方式的地位从“补充”转变为“并存”;在制度体系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得以完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得以改进。这些变革皆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制度奠基作用。

第三,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第三个关键节点。恩格斯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sup>[36]</sup>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使经济效率大幅提高,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效率与分配之间的矛盾加剧。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均被提及。针对这些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实现了社会分配正义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共融,以利益共享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分配的基本价值尺度,在拓展分配领域的同时完善了分配的权责划分<sup>[37]</sup>。在“全民共享”与“全面共享”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方面,新时代的分配制度持续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机制,积极改进再分配机制、倡导第三次分配,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共建;在“渐进共享”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收入分配领域由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发展。基于此,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成为推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三个关键节点。

## 2. 持续巩固: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安排会在路径依赖下得以持续巩固。究其缘由,制度变迁受制于四种报酬递增形式:一是大量的创设成本或固定成本;二是与制度相关的学习效应;三是直接和间接导致的协调效应;四是降低的不确定性和增加的适应性预期<sup>[38]</sup>。从历史维度审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发现变迁中极强的路径依赖使该制度总体趋于稳定并逐步强化。

第一,高昂的成本限制路径调整。制度创立依托于巨大的构建成本,制度推行也使得报酬递增并形成规模效应,进而制约现有制度发展。因此,在理性考量下,为避免已付出成本的严重损失,制度往往会沿着既定路径发展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持续探索构建符合现实情况的收入分配制度,使之从按劳分配拓展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初次分配拓展到政府再分配再到倡导第三次分配。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不仅历经了时间的检验,更耗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遵循渐进调适原则的重要缘由。

第二,学习效应引领路径创新。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干中学”的自增强效应通常难以逆转<sup>[39]</sup>。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历程是党和国家不断学习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党和国家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由此相应地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不断丰富可参与分配的多种生产要素。这一制度创新不

仅体现出党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学习贯彻，也体现党和国家对我国现实国情与未来发展的准确把握。

第三，协同效应强化路径锁定。制度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多种制度往往协调配套，共同产生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由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所有制结构锁定了分配制度演变的基本路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二十大指出要构建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其目的亦是强化分配制度的协同效应。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工资制度、分红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也逐步建立健全，共同形成庞大的“制度矩阵”，锁定着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路径。

第四，适应性预期形成路径依赖。制度的初始确立与后续调整总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因而为实现制度预期，行动主体会不断采取相应保障性措施来强化初始路径，最终形成路径依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现出两大适应性预期。一是致力于“做大蛋糕”，我国现行分配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良性匹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保证分配的物质基础。二是竭力“分好蛋糕”，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调整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失衡，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两大适应性预期皆是为了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以迈向共同富裕，这就进一步约束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本体演变，使其改革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

## 四、制度展望：理念、节奏与路径的有机统一

回溯过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蕴含的是对制度本体优化完善的要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配、对彰显时代特征的价值理念的贯彻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展望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从理念的贯彻、节奏的把握与路径的优化三方面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 （一）理念：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推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共进

长期以来，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不仅贯穿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更影响着分配的制度设计。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是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把握和解决的重点问题。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使分配制度既能拉动“发展”也能促进“共享”，在效率与公平均衡共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破解收入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分配格局失衡、分配差距悬殊等现实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用科学理念指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践。再者，公平合理的分配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体现效率，使之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全社会共建共享。

### （二）节奏：坚持渐进调适下的节点创新，把握客观规律与发展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依托宏观制度情境下的关键节点进行渐进调适与创新发展，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但面对既有分配制度下仍然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必须抓住关键节点下的改革时机，破除分配制度中路径依赖的弊端，使收入分配制度在渐进改革节奏下不断优化。一方面，在改革节点上，要面向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抓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契机，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持续创新完善，使之更好地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分配关系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客观规律，与时俱进、反映客观现实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在改革节奏上，要坚持渐进调适，从过往改革实践中汲取经验，处理好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保持收入分配制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避免因政策突变而激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建立并扩充分配制度改革的广大群众基础。



### (三) 路径: 构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流量收入差距和存量财富差距是收入分配体系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sup>[40]</sup>。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有效提升制度的协同效应, 加快搭建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在内的“制度矩阵”。首先, 初次分配制度的优化完善要着眼于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以及当前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需求, 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技术、数据、管理、知识等重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为推进分配总量增加和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 并进一步发挥新质生产力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有益功能。其次, 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强化再分配调节机制, 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着力解决税收调节力度较弱、社会保障不均衡、转移支付不足等问题,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促进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向橄榄型发展。最后, 要重视第三次分配, 健全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 有序发展救助、资助、捐赠等多种多样的第三次分配方式, 弥补政府再分配调节的不足, 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合力迈向共同富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党建, 2022 (11): 4-28.
- [2] 张永丽.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 (6): 148-159.
- [3] 刘儒, 李超阳. 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基本经验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 (4): 32-45.
- [4] 杨德才, 潘熙庆. 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既患寡又患不均”: 中国共产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及其经验总结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1 (6): 37-44.
- [5] 何丽丽, 王飞.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 实践进展、面临困境与路径选择 [J]. 西南金融, 2021 (8): 3-14.
- [6] 张蕴萍, 赵建, 叶丹. 新中国 70 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趋向研判 [J]. 改革, 2019 (12): 115-123.
- [7] 魏众, 王琮. 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经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6, 51 (11): 4-12.
- [8] 刘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进展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5 (2): 27-39.
- [9] 涂宇杰, 许铃川.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结构优化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3 (3): 32-40.
- [10] 钱诚.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 35 (11): 11-19.
- [11] 李玲. 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 (1): 97-102.
- [12] 蒋永穆, 豆小磊. 共同富裕思想: 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2 (6): 16-29.
- [13] 豪尔, 泰勒, 何俊智.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5): 20-29.
- [14] 庄德水. 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研究的三重意义 [J]. 理论探讨, 2008 (5): 142-146.
- [15] 赵晖, 祝灵君.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 (4): 24-29.
- [16] 卡波奇, 凯莱曼, 彭号阳, 等. 关键节点研究: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理论、叙事和反事实分析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 (2): 14-28.
- [17] 张海清. 制度如何形塑政策: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 (6): 55-59.
- [18] 陈燕.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 理论演进与实现路径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 (3): 115-120.
- [19] 杨钟馥. 中国收入分配变迁解读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109.
- [20]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1] 武力, 温锐. 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分析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6 (4): 4-12.
- [22]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7.
- [24]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5] 江泽民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7.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2-43.
- [2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党建，2017（11）：15-34.
- [28] 杨光斌. 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117-123.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 [30] 马得勇. 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5）：158-170.
- [31] 李靖，李春生.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J]. 湖北社会科学，2018（1）：45-52.
- [32] 蔡景庆. 共同富裕的多维度政治经济学思考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3）：39-46.
- [33] 马雪松.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J]. 社会科学战线，2022（6）：187-197.
- [34] 沙健孙.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103-115.
- [35] 范丹卉.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前景透视 [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28（1）：120-128.
-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 [37] 王维平，张娜娜.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社会分配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6）：192-197.
- [38] 刘和旺.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J]. 经济评论，2006（2）：64-68.
- [39] 赵晓男，刘霄.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J]. 当代财经，2007（7）：118-122.
- [40] 卢倩倩，许光建，许坤，等.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体系：演变、特征与展望 [J]. 宏观经济研究，2021（7）：5-15.

##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Fan Fengchun, Li S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reflected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tological change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germination freezing period, recovery and restart period,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period, deepening reform period and innovation and perfection perio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the macro-level institutional presets of system matching, promoted by the renewal of value concepts driven by politics, and optimized by the feedback of action subjects in interest games, reflecting multiple dynamics of change. Throughout the reform process, the logic of gradual adjustment at the key nodes promotes dynamic adjustments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 under path dependence ensures its continued consolidation. In the future,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adhere to node innovation under the gradual reform, build a coordinated and supportiv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joint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common prosper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收稿日期：2024-04-05；责任编辑：沈秀）